



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中国传统哲学通论

(第2版)

ZHONGGUO CHUANTONG ZHEXUE TONGLUN

本书从总体上概述中国哲学的精神、发展历程、基本问题、宇宙论、本体论、思想方法论、知行观、价值观，阐述了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向。全书以论为主，力图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故称“通论”。

宋志明 著

B21/2=2

2008



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中国传统哲学通论

(第2版)

ZHONGGUO CHUANTONG ZHEXUE TONGLUN

本书从总体上概述中国哲学的精神、发展历程、基本问题、宇宙论、本体论、思想方法论、知行观、价值观，阐述了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向。全书以论为主，力图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故称“通论”。

宋志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传统哲学通论/宋志明著. 2 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1 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09062-7

I. 中…

II. 宋…

III. 哲学-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7268 号

21 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中国传统哲学通论 (第 2 版) 宋志明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1398 (质管部)
电话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雅艺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170 mm×228 mm 16 开本	版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2 版
印张	13.75 插页 1	印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49 000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出 版 说 明

通识教育，有人称素质教育，也有人称博雅教育。无论如何称呼，其目的都是使受教育者不仅掌握必备的知识和能力，而且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健康人格，成为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哪些知识、能力和素质，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来看，大学生不论学什么专业，都应该是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除了掌握某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之外，最重要的是具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目前，从教育部到各个高校都充分认识到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重要意义。在教育部的倡导下，各个高校都开设了各具特色的通识课程。但是，课程不够系统，教材缺乏适用性，甚至没有教材的情况较为普遍，不利于通识教育广泛而有效地开展。

为了满足全国普通高校开设通识课程的需要，我们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和对几十所大学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推出“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其宗旨是拓宽学生的视野，扩大其知识面，提高其人文素养，塑造其科学精神。我们将陆续出版由兼具专业功底和教学经验的优秀作者编写的、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系列教材，为我国的人才培养服务，为高等教育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绪 论	(1)
一、中国有自己的哲学.....	(1)
二、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	(4)
三、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	(6)
第一章 中国哲学的精神	(9)
一、自强不息	(10)
二、实事求是	(13)
三、辩证思维	(16)
四、以人为本	(18)
五、内在超越	(24)
六、有容乃大	(30)
第二章 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	(33)
一、总体格局	(33)
二、发展阶段	(41)
三、主要问题	(47)

第三章 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	(53)
一、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53)
二、天道与人道	(57)
三、天人合一	(62)
四、天人之辨评议	(74)
第四章 中国哲学的宇宙论	(77)
一、天地之大德曰生	(77)
二、气化流行	(87)
三、天行有常	(94)
第五章 中国哲学的本体论	(101)
一、关于本体论	(101)
二、中国哲学本体论初探	(104)
三、本体的超越性：玄学与般若学	(109)
四、本体的本根性：华严宗与理学	(113)
五、本体的内在性：禅宗与心学	(118)
第六章 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	(123)
一、传统辩证法的类型	(123)
二、两一关系的理论研讨	(134)
三、传统辩证法的现代价值	(137)
第七章 中国哲学的知行观	(141)
一、重行的优良传统	(141)
二、知行关系的理论研讨	(150)
三、传统知行观的现代价值	(154)
第八章 中国哲学的价值观	(157)
一、传统价值观的总体取向	(157)
二、义利关系的理论研讨	(170)
三、内圣外王的操作模式	(178)
四、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	(180)

第九章 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向	(183)
一、本体论转向：从应然到实然	(184)
二、发展观转向：从健动到进化	(188)
三、知行观转向：从价值到知识	(191)
四、人学观转向：从子民到国民	(195)
附录 中国哲学家小传	(200)
再版后记	(211)

绪 论

本书既然题为《中国传统哲学通论》，在各章展开之前，有必要对中国有没有哲学、如何看待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有没有发展前景等宏观的问题先作一些阐述，是为绪论。

一、中国有自己的哲学

对于学哲学的人来说，“什么是哲学”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大家比较认同的说法有三种。第一种是通行的哲学教科书的说法：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这种说法可以成立，不过应当做一些深入的解释。这里所说的“世界”，不能理解为与人无关的、纯粹的客观世界，而是指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总和。这里所说的“观”，并不是对象性观察意义上的“观”。“世界观”不能等同于“观世界”，因为世界作为总体不可能成为人观察的对象。人就生活在世界之中，不可能观察到世界总体，正如理发师不能给所有的人理发一样。理发师也是人，他没有办法给自己理发。人也是世界的组成部分，没有办法站在世界之外看世界。这里所说的“观”，其实是“观念”之“观”，即以一种哲学观念来把握世界的总和。哲学实则是以哲学观念理解世界、把握世界的学问。这种哲学观念是作为人的哲学家提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观包含着人生观。准确地说，哲学应当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含人生观）

的学问，但不等于世界观。人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并不是人人都有自己的哲学。能够创立哲学理论，即提出关于世界观的系统学说的人，就是哲学家。普通人不一定创立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但可以接受或拒斥某种哲学理论。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哲学思考，但不必一定成为哲学家。依据“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含人生观）的学问”的说法，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当然有自己的哲学。黑格尔曾把哲学叫做“精神现象学”，套用他的说法，中国哲学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现象学。

第二种是古希腊人的说法，哲学就是“爱智慧”。这是哲学的原初义。在拉丁文中，“哲学”(philosophi)一词由“爱”(philo)和“智慧”(sophia)两个词组合而成。按照古希腊人的说法，哲学是一个动词，而不是一个名词。哲学不断地追求真理、探索世界总体的奥秘，关注着常学、常讲、常新的话题，关注着一个永远也讲不完的话题。所以哲学要永远讲下去，并且不断地花样翻新。中国古人所说的“弘道”、“穷理”、“通几”等，与“爱智慧”的意思相近，至少有“家族的相似性”。依据这种说法，也不能说中国没有哲学。哲学是人类的公产，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哲学可能产生于“人性的弱点”。人是有理性、有思维能力、爱智慧的动物，总想获得总体性的、终极性的认识，可是，每个人的生命又是有限的，这就造成了庄子所说的“人生有涯，而知无涯”的矛盾。这种矛盾只能在人类不断延续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解决。哲学是“爱智慧”，还不等于就是智慧。“爱智慧”是个动宾结构，是一个不断延续的探索过程。哲学注定处在“爱智慧”的过程中，哲学家的结论只具有相对性，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不具有终极的性质。哲学有人类性，也有民族性或区域性，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爱智慧的方式。中国人爱智慧的方式就是中国哲学。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民族精神的精华。哲学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准确地说，哲学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统一。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外国哲学史，掌握现当代国际哲学思潮的发展动向，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本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因此，作为一个哲学理论学习者和研究者，不能不对中国传统哲学及其现代价值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中国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们先哲就创立了独特的哲学思维模式，创立了一个个独具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华民族很早就进入了高度抽象的哲学思维阶段。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里，把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古希腊哲学并列为早期世界哲学的三大系统。与古希腊哲学相比，中国哲学不但毫不逊色，并且保持着更旺盛的生命力。古希腊哲学虽然有过辉煌的时代，然后世却走向了

衰微，文艺复兴时期才得以复兴；中国哲学则不然，它不仅源远，而且流长，绵延数千年而从未中断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哲学以其特有的精神风貌挺立于世界哲学之林。中国哲学不需要“复兴”，但需要发展。

哲学同科学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它跟民族性有密切关系。科学同民族性的关系不大，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例如，数学、化学以及物理学等，全世界只有一个，没有必要区分什么中国数学、美国化学、英国物理学……哲学则不然，它同民族性息息相关，法国哲学不同于英国哲学，英国哲学不同于俄国哲学，东方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跟其他民族的哲学都不一样，有其特有的民族性。它浓缩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社会心理、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认知结构等，简言之，浓缩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特有传统。中国哲学的民族性也就是中国哲学区别于其他民族哲学的特质，这种特质构成中国哲学独特的精神风貌。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的时候，首先应当着眼于它的独到之处，把握它的精神实质。

第三种是罗素的说法，他认为哲学介乎科学与宗教之间。科学以外在的物质世界为观察对象，追求客观的知识。宗教以精神世界为把握对象，建立终极信仰。哲学介乎二者之间。宗教以超人间的形式建立群体信仰，稳定性较强。哲学属于个体探索过程，变化性比较大。哲学思考往往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转换问题的提法。在哲学史上，最初侧重于本体论追问，探讨世界的本原；近代西方哲学实现知识论转向，探究知识是从哪里来的问题；现代哲学实现了实践论、存在论、价值论转向，特别关注生活世界、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哲学所探讨的问题，很难形成大家一致认可的结论。正如蔡元培所说：“哲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思想起于怀疑，因怀疑而求解答，所以有种种假定的学说。普通人都有怀疑的时候，但往往听到一种说明，就深信不疑，算是已经解决了。一经哲学家考察，觉得普通人所认为业已解决的，其中还大有疑点；于是提出种种问题来，再求解答。要是这些哲学家有了各种解答了，他们的信徒认为不成问题了；然而又有些哲学家看出其中又大有疑点，又提出种种问题来，又求解答。有从前以为不成问题的；有从前以为是简单问题而后来成为复杂问题的。初以为解答愈多，问题愈少。那知道问题反而随解答而增加。几千年来，这样的递推下来，所以有今日哲学界的状况。”^① 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不具有典型的科学形态，也不具有典型的宗教形态，称其为“哲学”似乎更为合适。

中国哲学事实上早已存在，只不过是没有采用“哲学”这种称谓而已。“爱

^① 《蔡元培哲学论著》，305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智”意义上的哲学，中国学人在16世纪就开始接触。1631年，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傅泛济意译、李之藻达辞的《名理探》，开宗明义首论“爱知学原始”，写道：“爱知学者，西云斐录琐费亚，乃穷理诸学之总名。译名，则知之嗜；译义，则言知也。”又说：“译名，则言探取凡物之所以然，开人洞明物理之识也。”“哲学”这个词是日本学者西周翻译西方哲学时创造的，中国学者接受了这个词。中国学者黄遵宪最早在《日本国志》（1895年初刻本）使用“哲学”一词。1901年蔡元培写《哲学总论》解释说，“哲学为综合之学”，“以宇宙全体为目的，举其间万有万物之真理原则而考究之以为学”。“爱智”同中国“弘道”、“穷理”言殊而旨同，中国学者正是从这个角度接受“哲学”一词的。中国哲学事实上早已存在，只是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尽管中国学术史上存在着文史哲不分、经史子集不分的情形，但《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王充的《论衡》、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等著作，都带有哲学史的性质。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设立专门的哲学系，创办哲学刊物，出现专业的哲学家，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情。

二、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

后现代主义者德里达访问上海时，在与王元化谈话中曾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这种看法在中国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德里达的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贬低中国哲学的意思，而是一种解构主义的言说方式。在他的眼里，不仅中国哲学不具有“合法性”，西方哲学也不具有“合法性”。从2000年开始，中国学术界有许多人热衷于研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并且形成了热门话题。提出这一问题有其积极的意义，那就是对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不满意，要求突破现有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把中国哲学研究引向深入。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作为学术问题，当然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不过，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有些偏激。“合法性”是个政治、法律用语，套用在哲学领域似乎不大合适。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能力为哲学“立法”，遑论哲学的“合法性”。“合法性”的提法缺少弹性，似乎令人只能做出一种选择：要么合法，要么不合法；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二者必选其一，不可兼容，没有回旋的余地。与其研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倒不如研讨现有的中国哲学研究方式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更为确切。“合法性”是刚性判断，而“合理性”是个柔性判断。“合法性”与“不合法性”是不能并用

的，而“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则是可以并用的。应当承认，目前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确实存在着不合理性。比如，有的人简单地套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模式剪裁中国哲学史，有人简单地套用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研究模式，生硬地把中国哲学家归结为唯物论者或唯心论者。读了这样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使人无从了解中国哲学自身的丰富内容、自身的理论特色，如入五里雾中。这种不合理性当然应当纠正，但也不能完全否认现代学者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也存在着某种合理性。他们毕竟采用现代研究方法，对中国哲学的资料和思想脉络作了一些梳理，取得了许多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我们可以超越前人，但不能以“合法性”一词把他们全盘否定。

在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中，有的学者提倡“中话中说”，主张拒斥西方哲学的霸权话语，采用中国固有的话语表述中国哲学的意涵。他们反对“中话胡说”，反对采用西方的哲学话语表述中国哲学的意涵。这种主张的积极意义在于强调中国哲学的特点，反对照搬照抄西方哲学的研究模式，但并不具有可操作性。现代汉语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后形成的，来自西方的许多名词、术语，以日语为中介，早已变成了现代汉语语汇的一部分。倘若把这些“胡话”一概弃置不用，我们将无法交流思想。据说，张之洞曾经下发一个文件，要求属下今后不要滥用“新名词”。有人委婉地向张之洞指出：你提到的“名词”二字，本身就是一个新名词。看起来在张之洞时代就不可能做到“中话中说”了，时至21世纪，当然就更加不可能了。问题不在于“中话”还是“胡话”，关键在于“人话说”：用现代中国人能懂的语言表述中国哲学的精义。这里涉及的问题是：怎样看待和处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哲学是西方的特产还是人类的公产？中国哲学研究如何创新？冯友兰说过：哲学无定论。意思是说，哲学是不断的探索过程，结论是相对的，不可以拘泥于某种现成的说法。西方哲学只是一种哲学，并非哲学的范本。有人说哲学是“单数”，在他的心目中，只有西方哲学才称得上哲学，别的都不算数。则显然是偏颇之见。实际上，哲学从来都是“复数”，绝非“单数”。照搬照抄西方哲学的研究模式不可取，卖弄西方哲学的新名词更不可取，但不能拒斥西方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如果拒斥西方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把自己封闭起来，中国哲学便没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了。中国哲学应当是一门发展的学问、创新的学问，不能故步自封，不能食洋不化。

中国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相比，其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已成为历史，而前者并没有成为历史。中国哲学在现时代仍然续写着自己的传统。这里所说的传统，并不是指历史遗迹，而是指能为现时代的中国人所开发和利用的思想资源。“传统”中的“传”是个动词，是我们根据自己的精神需要对先哲理论思维成果做出的选

择、诠释和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不是既定的过去时，而是正在形成中的现在时和未来时。换句话说，传统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时代性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传统”中的“统”是个名词，是指中华民族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并不是以往儒家所标榜的道统，也不是现代新儒家所标榜的“道德形上学”。现时代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它是指中国传统哲学在现时代的新展开，是指能够指导现时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活的学问。它不是历史上某种哲学理论的复兴，而是现时代人的精神创造。这样的中国哲学显然应当以现时代的中国人为主体。所谓继承，是指延续、弘扬优良传统；所谓发展，是指突破原有的传统，增加新的内涵。套用冯友兰的话说，现时代的中国哲学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的，不是照着中国传统哲学讲的。“接着讲”，讲出了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意。现时代的中国哲学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一门发展中的学问，不是古代某种哲学的翻版。我们反对食洋不化，也反对食古不化。

三、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

现时代的中国哲学是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展的，理所当然应成为现代化事业的思想动力和精神支撑。可是，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由于研究方法的落后，由于受到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我们的中国哲学研究似乎没有很好地发挥这种作用。

关于中国哲学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学术界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二者是不相容的，中国哲学传统对于现代化只有负面影响，只有清除固有的哲学传统的负面影响，才能推进现代化进程。马克斯·韦伯发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与新教伦理有密切关系，认为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他把儒家伦理同新教伦理加以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儒家伦理无助于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由于受到西化思潮和“左”的思潮的影响，把中国哲学传统视为现代化阻力的观点长期在思想界占主导地位。许多人把中国没有走向现代化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哲学传统，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传统运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反传统的呼声达到了顶点。可是，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反而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在我们大力反传统的同时，接受中国哲学传统影响的“亚洲四小龙”，不但没有反对中国哲学传统，反而成功地利用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思想资源，实现了现代化的目标。事实雄辩地证明：那种把中国哲学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哲学传统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前提，这就是现代新儒家“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说法。这种看法的合理性在于肯定中国哲学传统与现代化兼容，推翻了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偏见，但缺少历史事实方面的根据。如果正视历史事实的话，应当承认，从中国固有的哲学传统的确没有“开出”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从学习西方起步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代化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它的出现有体制的原因，有生产力水平的原因，有历史机遇的原因，不可能仅仅从某种哲学理论逻辑地推导出来。

尽管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从学习西方起步的，但不等于说一定要采用西方的发展模式。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中国必须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当然包括中国哲学在内。我们应当从中国哲学讲究自强不息、实事求是、以人为本、道德价值、和谐团结的思想资源中寻找现代化事业所需要的精神支撑和理论指导。事实证明，中国传统哲学不是现代化的阻力，而是现代化的动力。体现时代精神的中国哲学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民主法制建设，有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现时代的中国哲学已经成为世界哲学论坛的组成部分，应当在世界哲学论坛上有自己的声音，回应全球性的哲学问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国际社会的交往越来越频繁，联络越来越快捷，地球似乎变“小”了，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地球村”。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思考不可能再限制在本民族、本国家的范围内，世界化成为必然的大趋势。一些令人普遍感到困惑的全球性哲学问题，吸引了全人类的目光，成为各国哲学家研究的共同课题。例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国际交往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如何建立世界伦理？在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的情况下，如何重建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情况下，如何排解人们在精神上的焦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及个体之间的关系？如何从后现代的视角看待当今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如何纠正科学主义的偏颇？

面对这些全球性的哲学问题，许多西方哲学家感觉到，西方原有的哲学思想资源已经不够用了，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哲学，重视对中国哲学思想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希望在双方的对话中激发新的哲学智慧。海德格尔很看重老子的思想，在同日本哲学家的《在通往语言的路上》的讲话记录中，他对东方的“非概念性语言和思维”表示钦佩。他重新思考本源性问题，很可能受到老子“无”的思想的启发。环保主义者在纠正西方人“征服自然”的错误观念时，常常引证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理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第二次世界伦理会议”，

高度重视儒家哲学，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了《世界伦理宣言》。哈贝马斯在访问上海期间，向他的同行表示，希望中国哲学在推动世界哲学发展上发挥作用。

由于全球性哲学问题的出现，中国哲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哲学特别关注人生问题和价值问题，似乎更贴近现时代世界哲学发展的主题。中国哲学历来重视道德价值问题，可能对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的重构有帮助。我们应当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对人类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需要中国哲学提供精神支撑和理论指导，全球性的哲学问题需要中国哲学做出回应，这两种需求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

中国哲学在现时代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从20世纪初传入中国，至今快90年了，已经同中国的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同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资源结合在一起，成为现时代中国哲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标志着哲学思维的重大变革。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这里所说的“哲学家”是指西方哲学家，并不是指中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宣告“解释世界”的哲学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实践哲学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可是，我国的哲学教育由于受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影响太深，对此似乎没有充分地重视，仍旧停留在“解释世界”的水平上。我们不能再沿用“以苏解马”的模式了，应当解放思想，敢于独立思考，直接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提高我们的哲学理论思维创新能力。

注重实践历来是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发扬这种传统可以消解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陌生感。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对于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来说，是个突破；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却可以产生共鸣。中国现代哲学史表明：注重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是同步进行的。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仍旧会延续这一方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永葆中国特色、适应全球化大趋势的中国哲学将有光明的发展前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1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一章】

中国哲学的精神

所谓“中国哲学的精神”，乃是指现时代的中国人对中国哲学特质的领悟。“精神”是一个关涉仍然活着的人的话语，只有对活人才谈得上“精神”二字。我们的先哲已经作古了，已无“精神”可言，但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供我们享用。我们应当珍惜这份遗产，充分利用这份遗产，打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国哲学的精神”可以说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先哲思想论著的心得，是我们作为后人对于先哲思想特质的领会，是我们与先哲的精神对话，是我们与先哲的心灵交契。尽管先哲留下的精神遗产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基因，但不能直接为我们受用，必须经过我们的理解和转化，才能成为我们可以受用的、活的文化精神。

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的时候，首先应当着眼于它的独到之处，把握它精神实质。对于中国哲学独到之处、精神实质的了解和掌握，并不是一件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进行比较充分的材料积累，作扎实的研究，“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逐渐形成一种自己的看法。我们要想了解中国哲学的独到之处和精神实质，还必须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同外国哲学相比较，加深自己的理解。没有比较和参照，就不可能有鉴别，也不可能有理解。

关于中国哲学的精神，既然是一种学习和研究的心得，无疑是一个有个性的话题，可能形成不同的看法。许多中国哲学史家都十分关注这个话题，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冯友兰曾用“极高明而道中庸”概括中国哲学的精神。他写了一本

题为《新原道》的书，表述他对中国哲学精神的理解。这本书翻译成英文，书名叫做《中国哲学的精神》。杜国庠不同意冯友兰的看法，他把中国哲学的精神概括为实事求是。牟宗三把中国哲学的精神概括为“道德的形上学”，写了一本题为《中国哲学的特质》的专著。他们提出的种种看法，都很有特色，都富有启发性，但都不是最终结论，也不能代替我们每个人的理解。我们对中国哲学精神的了解和掌握，乃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何谓中国哲学的精神”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研究中常讲常新的问题，每个学习者和研究者都可以拿出自己的答案。我们主张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各种学术见解都有发表的机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共识。我们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下面几点。

一、自强不息

《周易·乾卦·象传》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里所说的“天”，并不是今天所说的大气层，而是指世界的总体，其中包括地，也包括人在内，跟现代的哲学范畴“世界”或“宇宙”是一个意思。这句话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积极进取意识，代表了我们先哲在世界观和人生观方面的基本态度。

在世界观方面，中国古代哲学家提问题的方式就同古希腊哲学家不一样，思路也不一样。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第一个哲学问题是：“世界是什么？”他们首先把世界总体作为判断的对象，把世界处理成一幅静态的画面，看成“有”（存在）；然后从“有”（存在）出发，开始自己的哲学思考，并且采取了分析的进路。他们对作为存在的世界总体加以分析，寻找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开启了西方哲学的思想传统。中国古代哲学家提出的第一个哲学问题是：“世界怎么样？”他们首先把世界总体作为描述的场景，把世界看成是动态的过程；然后从“生”出发，开始自己的哲学思考，并且采取了综合的进路，概述世界的总体特征。实际上，人只能对有限的事物才能做出“它是什么”的全称判断，而世界是无限的（用中国哲学的术语说叫做“未济”），对于无限的世界，怎么可能做出“世界是什么”的全称判断？显然，中国哲学提问题的方式同西方哲学相比，更具有合理性。我们的先哲崇尚健动，以动态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人生。在他们看来，宇宙是生生不息、流迁不止的运动过程，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孔子曾站在河边，面对奔流的河水发出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